

历史回眸

详情纪实 实话实说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始末

红色恋情



贺子珍唯一的女儿
和父亲毛泽东在一起

- ◆ 云山初识英雄郎
- ◆ 少女情怀定终身
- ◆ 井岗山上情意浓
- ◆ 子离女别慈母心
- ◆ 钢铁难融情缝裂
- ◆ 相思难解心头结
- ◆ 相见时难别亦难



贺子珍部队在井冈山时的土墙头子



要求严惩印尼排华事件凶手的群众

毛泽东义释女匪首

印尼两次排华事件纪实 敦煌国宝被窃真相

从“西北王”到“草头王”

——胡宗南在东南沿海的一段海匪生涯

胡宗南文选

一九九八年 第六期 双月刊 (总第八十四期)

ISSN 1004-8170



2A37/24



党组书记、行长陈二尧向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彭茂吾汇报工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为顺应电力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建设银行湖南电力专业分行于1988年正式成立。十年来,湖南电力专业分行积极发挥银行职能,广泛筹措资金,大力支持湖南经济的发展。先后向全省500多家企业单位发放贷款140多亿元,经办国家建设投资60.2亿元,支持了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及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是为湖南两个最大水电工程东江、五强溪水电站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受到建行总行、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和表彰。从1990年来,连续8年保持了省委、省政府授予的“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1994年向商业银行转轨以来,湖南电力专业分行坚持“改革、发展、管理、效益”的工作方针,积极转变思

建行湖南电力分行



建行湖南电力专业分行党组成员在讨论学习《中国建设银行关于违反金融规章制度行为处理的暂行办法》

想观念,不断开拓业务领域,开办了国际金融、房改金融、委托贷款、债券代销兑付、票据承兑及贴现等商业银行业务。服务手段日趋现代化,开通全国建设银行电子汇兑系统,实现了同步清算,24小时到账使用,发行了电子货币——储蓄卡,居民储蓄存款在全省建设银行系统通存通兑。经营实力显著增强,四年来各项存款余额翻了一番多,1996年突破32亿元,年底余额为30.2亿元,1997年在五强溪专业支行、东江专业支行、常德

办事处移交当地建行,单一储蓄所移交长沙市分行的情况下,年底余额保持在24.7亿元;信贷业务稳步发展,四年累计发放信贷贷款40多亿元,1997年底余额为28.9亿元,年平均增长16%,经办国家开发银行委托贷款55.4亿元;拥有各项资产总额78.2亿元,四年增长1.9倍;经营效益连年增长,一年一个台阶,不良贷款率一直控制在10%以内,贷款利息实收率保持在90%左右,四年实现利税2.6亿元,平均人平66万元。特别是去年实现利润7069万元,人均创利润19万元,各项指标在全省建行系统名列前茅。发展到现在,湖南电力专业分行已是下设19个营业网点,资金实力雄厚,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国有银行。

建行湖南电力专业分行营业部拓址营业

1998年,湖南电力专业分行全体员工在分行党组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完善改革、加快发展、强化管理、增进效益”十六字方针,以效益为中心,以筹资和防范风险为重点,狠抓双文明建设,努力把全行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建设银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中国农业银行 浏阳市支行



行长:陈定汪

中国农业银行浏阳市支行经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及湖南分局批准,经营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等六项外汇业务。全行员工本着“竭诚服务、信誉至上、高效廉洁、文明办行”的宗旨,为外经外贸公司、企业和广大客户提供一流服务,并愿同社会各界广泛合作,携手共进,迈向更加辉煌灿烂的二十一世纪!

地 址: 湖南省浏阳市圭斋东路一号
电 话: (0731)3611880
传 真: (0731)3612018
邮 编: 410300



群策群力,共商发展大计



优质服务,顾客至上



巍峨挺拔的办公大楼

目
录

[本刊特稿]

红色恋情——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始末

.....尹纬斌 思夏/04

彭大将军魂归故里

.....鄢光润/18

印尼两次排华事件纪实

.....杨建成 郭世钦/20

[伟人轶事]

胡耀邦吟《新桃花源记》

.....罗永常/25

[旧案揭秘]

敦煌国宝被窃真相

.....陈作义/26

陈牧农军长冤死谁手

.....刘峻德/35

[人物春秋]

打入日伪心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瀛洲居/37

2A37/4

主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编辑 出版
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
湖南文史杂志社广告发行部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 135 号
电话:4405525(总编室) 4405593(编辑部)
4405613(广告发行部) 邮编:410011
印刷
湖南省创世广告印务有限公司(8856240)

[名人姻缘]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生死恋

.....惠 卿/45

[剿匪纪实]

毛泽东义释女匪首

.....陶朱问/50

从“西北王”到“草头王”

——胡宗南在东南沿海的一段海匪生涯

.....陈广相/56

[文博精华]

世纪性大发现

——长沙走马楼吴简发掘纪实

.....邱东联/65

[民国档案]

民国时期的湖南空军

.....洪 流/72

[传记长廊]

张之洞——长篇历史小说连载之三

.....唐浩明/77

社长、主编:张智军
副社长、常 李武扬
务副主编:
副 主 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周 亮



公私合营了

目
录

[本刊特稿]

红色恋情——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始末

.....尹纬斌 思夏/04

彭大将军魂归故里

.....鄢光润/18

印尼两次排华事件纪实

.....杨建成 郭世钦/20

[伟人轶事]

胡耀邦吟《新桃花源记》

.....罗永常/25

[旧案揭秘]

敦煌国宝被窃真相

.....陈作义/26

陈牧农军长冤死谁手

.....刘峻德/35

[人物春秋]

打入日伪心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瀛洲居/37

2A37/4

主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编辑 出版
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
湖南文史杂志社广告发行部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 135 号
电话:4405525(总编室) 4405593(编辑部)
4405613(广告发行部) 邮编:410011
印刷
湖南省创世广告印务有限公司(8856240)

[名人姻缘]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生死恋

.....惠 卿/45

[剿匪纪实]

毛泽东义释女匪首

.....陶朱问/50

从“西北王”到“草头王”

——胡宗南在东南沿海的一段海匪生涯

.....陈广相/56

[文博精华]

世纪性大发现

——长沙走马楼吴简发掘纪实

.....邱东联/65

[民国档案]

民国时期的湖南空军

.....洪 流/72

[传记长廊]

张之洞——长篇历史小说连载之三

.....唐浩明/77

社长、主编:张智军
副社长、常 李武扬
务副主编:
副 主 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周 亮

红色

——贺子珍与



△毛泽东、贺子珍 1937 年在延安

○ 尹伟斌 思夏

恋情

毛泽东分手始末

作为一个女人，她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生活在颠沛流离的漂泊之中。与毛泽东相处10年，生下6个孩子；1936年出走延安，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寂寞而孤独的生活。分手23年后只有一次1个多小时的重逢，独居的每一年，都要准备一式三份的礼物，送给李敏、李纳和江青……这就是贺子珍的人生数字。

永新一枝花

1909年9月，时值中秋，天高气爽，丹桂飘香，地处井冈山麓的永新县城，一个女孩哇哇坠地，伴着响亮的哭声，来到这个烽烟四起的世界，喜悦的父母，为这个眉眼俊俏的女儿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桂圆。做为父母，他们希望自己女儿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幸福美满。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总难遂人愿，就是这个叫桂圆的女孩，她的一生虽有过的鲜花绽放，但伴随她的，更多的是艰难、坎坷和挫折。

小桂圆有一个温暖的家，她的祖籍在永新万源山区的黄竹岭，祖父辈是永新的望族，拥有很多田产和房屋。她们的父亲贺焕文是个老实憨厚的读书人，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母亲杜秀，是广东梅县人，生得异常美丽，读过四书五经，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桂圆有兄弟姐妹五人，她是老二，他们兄妹非常要好，父母悉心呵护着他们，生活条件是很优裕的。

1925年，15岁的桂圆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继承了母亲姣好的面容，中等身材，白皙的皮肤，秀气的瓜子脸，又长又弯的眉毛下一双溢满灵气的大眼睛，温柔、沉稳、有心计，被人们称为“永新一枝花”。

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加之桂圆自己的努力，一向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父母，同意了她们上学读书的请求。于是，她和妹妹一起，插班进了福音堂女校。

上学后，崇尚武侠的她不喜欢桂圆这个软绵绵

的名字，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她同毛泽东结婚后，曾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她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就被沿用下来。可是，她自己却一直喜欢用自珍这个名字。

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一时成为永新县的美谈，人们称他们为“永新三贺”。

从此，17岁的贺子珍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

正当贺子珍他们轰轰烈烈地干革命的时候，永新的国民党右派举起了屠刀，贺敏学等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当时子珍已调到吉安，身兼国民党吉安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二职，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她联络了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攻破县城，救出了狱中的贺敏学等人。

暴动不久，永新即遭到了湖南及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县城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营的进攻，缴获了100多支枪。战斗结束后，贺子珍在战斗中两枪击毙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今天，永新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她的传说。

这次战斗结束后不久，永新又遭到了敌人更猛烈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贺子珍是撤退队伍中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兵。

初识英雄郎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了井冈山。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并约定会见地点在步云山那

座像庙宇一样大的房子里。

那天,永新、莲花、遂川的党员和袁文才、王佐一早就来到了步云山,迎接毛泽东。贺子珍当时正在打摆子,听到消息也跟了去。毛泽东只带了5个革命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上了步云山。他们的军装虽不统一,但很整齐,每人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的带子。毛泽东个头很高,十分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但没有及肩,皮肤晒得很黑,神色略带激战后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着他的睿智、温和与魅力。他首先同袁、王二人握手,并把同来的战友介绍给他们。袁、王也把山上的党员介绍给他。毛泽东向每一个人握手问好。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自珍。”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着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她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双方的商谈是融洽的,袁文才和王佐当场表示:欢迎毛泽东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并把1000块银元送给革命军做军需。

农民自卫军迎接毛泽东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袁文才为了工作需要,安排毛泽东住在离自己家只有几步之遥的茅坪八角楼。而贺子珍恰好在袁文才家养病。毛泽东每次到茅坪河边散步,或到外面找人谈话,都从袁家路过,所以常常能见到贺子珍,每次见到,毛泽东都要走过来,问她身体恢复得如何,态度和蔼可亲。

塘边定终身

1928年6月,三打永新胜利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了早日把永新根据地建立起来,贺子珍带领一支工作队,来到西乡塘边村开展工作,住在一个贫农老婆婆家里。

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来到了塘边村,也被安排在老婆婆家。他是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制定统一的土地法的。

贺子珍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深,也更加信任这位亲切的上司。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19岁的少女,贺子珍深深地爱上了面前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她在心里不停地想: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与他相伴,聆听他的指点,得到他的帮助,那该有多么好!

少女的心事是从来不肯轻易吐露的,贺子珍虽是个反封建、提倡婚姻自由的先锋战士,但她毕竟是一个初涉爱河的女孩,平时的勇敢、大胆、泼辣都被初恋的羞涩所代替。然而,爱情所带来的兴奋是无

法压抑的。尽管她想这份爱藏于心底,却又那样清楚地写上她的眼角眉梢。毛泽东从她的神态和表情中,读懂了这个质朴、纯正的少女的心思,也被她的真情所感动。做为一个中年男子,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俏丽、迷人、充满青春活力的纯洁少女。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写着,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他那英俊的面庞。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那双注视着自己的炽热的、溢满真情的大眼睛。瞬时,一束爱的火花撞击着他们的心灵。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向脚尖,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

面对姑娘的羞怯,毛泽东赶忙搬过一把椅子,请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温存地对她说:“你是个好姑娘、好同志,我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及今后的奋斗目标。

从毛泽东的讲述中,贺子珍知道他追求革命,献身事业的经过。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带着3个孩子仍留在湖南老家开展地下工作,但由于关山阻隔,敌人封锁甚严,已久无消息了,外面传说她已被国民党杀害了。

听着毛泽东沉重的叙述,贺子珍被他那磊落的坦诚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无暇料理自己的生活,他多么需要一位爱他的女人来帮助、照顾呀。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很久,谈得那样投入,那样亲热,从那一刻起,两颗赤诚的心已悄悄地融汇。在这一年的金秋,当人们欢庆丰收的时候,毛泽东与贺子珍也收获了他们真挚的爱情。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席庆贺,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一切都得从简。

井冈情意浓

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不久,即相携回到井冈山,他们先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后来,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他们搬到茨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从此,贺子珍告别了一线的战斗生活,开始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新生活。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在井冈山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山上消息闭塞,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毛泽东很需要知道山外面的敌情,他对敌占区报纸的需要,就像人离不开水和空气一样。为了满足毛泽东对报纸的需要,让他更好地布置工作,贺子珍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此,她费尽心机,设法同上山来的小贩取得联系,请他们来时多带些报纸。就是这样,她建立了几

条购买报纸的艰难渠道。虽然为此她付出了很多心血,但看见毛泽东读报时露着异样光彩的笑脸时,她便感到欣慰,因为她的辛苦得到了最好的报偿。毛泽东根据报上的消息,作出的每一个重要决定,也都有着她的一份努力。

1929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的围剿,山上的生活更困难了。

同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的柏露,召开了前委、特委、军委和地方党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毛泽东带领红四军下山到外线去打击敌人,以便里应外合,粉碎敌人的围剿。

1930年10月,由于长途行军作战,天气炎热,毛泽东大便干燥,便不下来,又吃不下东西,身体日渐消瘦,难于支持。心情焦急的贺子珍,用手从肛门内把粪便掏出来,随后她又向医生请教。那时条件差,医院没有灌肠设备,贺子珍向医生借了个大便通气管,把日用肥皂放在温水盆里,像磨墨一样在脸盆的周围磨着,把它溶解。然后她让毛泽东伏在床上,用管子插进肛门,把肥皂水灌进去,几分钟后,大便随肥皂水便出来了。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毛泽东的便秘。为了缓解毛泽东的便秘,改善饮食,贺子珍又到老表家里头弄来空心菜和苋菜,给毛泽东增加维生素和纤维的摄入量。这样,毛泽东的便秘真的好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很感动,称赞说:“贺大姐既是毛委员的好秘书,又是炊事员、卫生员、护理员。”

第二次反“围剿”时,贺子珍随毛泽东住在吉安东固歼上村的一家客栈里。由于环境艰苦,营养差、消耗大,毛泽东的身体更加瘦弱,这可急坏了贺子珍。

为了给毛泽东补充营养,贺子珍召集警卫员、勤务员商量,她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一定要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大家想来想去,也没有结果。最后,还是贺子珍想起了田螺,她对大家说:“早稻蒨下去了,长势很旺,田里的螺一定很肥。我用纱布做两个兜兜,你们找两根竹子破开,搞个圈圈,把兜撑开扎好,到稻田里或田沟上捞螺丝、捉鱼虾,用辣椒炒炒,可好下饭咧。毛委员是湖南人,喜爱吃这种口味的菜。”

警卫员吴吉清、陈金水听了立即行动,很快,他们提着沉甸甸的布兜回来了,田螺拣了三、四斤,小鱼小虾也网到了两斤多。

贺子珍接过布兜,掂了掂,夸奖说:“真不少哩,毛委员吃好了,打了胜仗,也有你们一份功劳咧!”

下午,她又嘱咐吴吉清,顺便来摘几把竹笋,用来做竹笋炒田螺。

“啧啧,味道好,这两样菜真下饭!”晚餐桌上,毛泽东赞不绝口。

贺子珍亲手炒的两样菜:田螺炒竹笋,竹笋炒鱼虾,都放了干辣椒,味道又鲜又辣,很开胃。毛泽东吃得很高兴,问子珍:“永新冬酒吃完了吗?”“还有一点,留着打胜仗再喝吧!”子珍回答说。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田螺,兴奋地讲着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部署。

子珍生怕他的情绪受影响,赶紧给毛泽东斟满了一杯冬酒:“好,提前喝庆功酒吧。”

悠悠慈母心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后,两人相处10年,总共生下6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李敏一个女孩。这是当时艰难环境的历史憾事。可做为一名女性,一位母亲,那颗悠悠的慈母之心该是何等的伤悲。但为了革命,为了更多孩子将来不再离别母亲,更多的母亲不必失去骨肉,贺子珍,这位平常而伟大的女性没有犹豫,默默地承受了这份切肤的痛苦,把那一腔热情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1929年,在红军二打龙岩的时候,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了一个女孩。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孩,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三个男孩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子珍说:“她挺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呢!”

龙岩是福建的一个中等县城,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也比较富裕。红军入城后,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毛泽东自然高兴。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过早的做母亲,并非好强的子珍所愿。但看着孩子稚嫩的小脸,母亲的本能油然而生。

为了减轻子珍带孩子的负担,不久,毛泽东便为孩子找了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看着子珍依依不舍的神情,他耐心地劝慰她:“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贺子珍强忍着心中的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一个坚强明理的女性,她不愿日理万机的丈夫为自己操心。

红军撤出龙岩时,当时考虑很快还能回来,为了让子珍产后多休息几天,毛泽东派人将子珍母女隐蔽在城外一老百姓家里。

但革命还在继续,斗争更加艰苦,子珍和孩子分手的一天总是要来的。这天,她用被子把婴儿包好,亲自把她抱送到联系好的那位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留给子珍,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大嫂手里,说:“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送走孩子的子珍,心里十分难过。但她并没有过分伤心,她以为红军在这一带活动,见到女儿不会太困难。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母女的永别。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进龙岩,当贺子珍为即将见到久别的女儿而兴奋时,前去找寻的毛泽民带来消息:女儿已经不在人世了。

兴奋的子珍被这不幸的消息震懵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愣怔地坐着。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安慰她说:“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长汀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这是一个男孩,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与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并列。当时子珍正患疟疾,医生怕传染孩子,不准她喂奶,毛泽东托人给孩子找了个江西奶妈。

江西人把小孩称为毛毛,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随着奶妈叫岸红毛毛。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浓眉大眼,很像他爸爸。毛泽东特别喜欢他,每次来医院,总要把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的。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子珍的身边,自己坐在母子旁边,静静地凝视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很讨人喜欢,他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6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孩子,虽然他也随父母历尽艰辛,但却得到了更多的宠爱。

长征开始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负担,也为了孩子的安全,毛泽东和贺子珍商定,把毛毛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叔叔、婶婶毛泽覃、贺怡夫妇抚养。临别前,子珍用自己的灰军装,就着灯光,千针万线为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袄,也缝进了一腔依依惜别的慈母情。

瑞金和苏区被敌人占领后,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孩子会遭不测,便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家里。后来,毛泽覃在战斗中牺牲了,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到处寻找毛毛。但因时间久远,终于未能如愿。贺怡还因此不幸遇难。

1933年,毛毛出生不到一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这个由傅连璋接生的男孩,由于不足月,而没能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了。一天下午,当她所在的休养连来到贵州白族的一个村庄时,贺子珍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一个可怜的女孩。当时,部队正在急行军,后面的追兵随时都可能赶到。贺子珍在担架上生完小孩后,来不及揩掉衣服、担架上的斑斑血迹,担架员便抬着她匆忙上路了。

前面的路程是遥远的,未来的斗争是艰苦的,对于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只有一个处置办法:交给当地

老乡抚养。钱希钧用大衣把孩子包好,对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取个名字吧,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贺子珍用虚弱的手拿出身上仅有的4块银元,对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至于名字,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这样,贺子珍又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的痛苦。后来,她曾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的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丢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也无法知道她的生死。”一片思女之情,缠绕着一颗悠悠慈母心。

1936年,随中央机关迁入保安的贺子珍,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第五个孩子女儿娇娇,即他们的六



△毛泽东、贺子珍 1937 年在延安

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李敏。她后来频繁往来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给贺子珍晚年清冷的生活带去了许多慰藉,也为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给予依托,这是贺子珍抛夫别女不幸中的大幸。

同年,贺子珍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了。这时,由于环境的变迁,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裂痕,倔强的贺子珍毅然离开毛泽东,单身前往苏联学习和治疗。

到莫斯科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不幸的是,刚刚10个月的小孩得了感冒,由于医疗条件较差,护理不当,孩子夭折了。

万分悲痛的贺子珍,埋葬了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也埋葬了她与毛泽东长达10年之久的婚姻,埋葬了她后半生的希望,开始了没有欢乐,没有温暖的寂寞

而辛酸的孤独生活。

钢铁难相融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抗日救亡,扩大根据地,有多少新的工作等待着这些经过战火和困难考验的党的优秀儿女们去承担。面对新的政局,目睹战友们高涨的情绪,生性好强的贺子珍也跃跃欲试,她不愿再当家属,做秘书的工作了,她要走出去,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干自己的事情。她再三向组织上申请分配给她新工作。但组织上考虑她的身体比较弱,又怀有身孕,让她继续做秘书工作。

但贺子珍不愿意再做秘书工作了,尽管她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她实在太想独立承担任务了。自从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一直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支持毛泽东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上了。如今,革命形势发展了,她太希望有一个公开的独立的锻炼机会了。

为了满足她的这一迫切心情,在她随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组织上便分配她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做科长,负责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贺子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份新的工作。

1936年,为了争取进攻瓦窑堡的国民党东北军,党中央和军委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迁往延安。

贺子珍随毛泽东进驻延安后,住在凤凰山麓的一家窑洞里。窑洞与宝塔山上的宝塔遥遥相望,因离街中心较远,显得十分幽静。窑洞一排三间,进门厅为会议室兼会客室,左边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右边是卧室。门前院子正中临时摆放了几块石墩,是专供人们交谈或休息用的,院内收拾得既干净又整洁。

贺子珍随毛泽东进入延安后,她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要适应发展的形势,原来一点文化底子太不够了。贺子珍参加革命前虽然在外国传教士办的福音堂学校读过几年书,父亲也教授过她一些古诗词,还当过小学教员,但参加革命后,由于战争环境恶劣,特别是与毛泽东结婚后接二连三地生孩子,加上身体负伤,耽误了学习。长征后,在工作中,她渐渐感到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的知识太欠缺了,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

一天晚饭后,太阳收敛了它的余辉,贺子珍与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交谈中,贺子珍用征询的口气向毛主席提出:为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水平,想进抗大学习。

毛泽东一听贺子珍的话语,先是有些惊愕,但他很快平静了下来,用关心的语气问道:“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二课,军事化行动,你受过重伤还没有完全康复,身体能吃得消吗?”

贺子珍认真地回答:“我们辗转战斗在根据

地,又经过了长征,那样的艰难困苦都熬过来了,我在长征负伤,死里逃生,也挺过来了,难道到抗大学习还畏惧?还怕坚持不下来吗?”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执拗的脾气,同时认为她提出的要求也合乎情理,因此,默默地点头应允了。

贺子珍把还只有3个月大的女儿娇娇(即李敏),托付给四川籍女战士张秀英照管(张秀英生下的孩子只几个月就夭折了,而她的奶水充足,请小张喂养和照管娇娇,贺子珍很放心)。当她把一切安排妥当后,便到延安北门里抗大报了名,参加了抗大第一期高级班的学习。贺子珍当时只有26岁,但在班里算是年龄比较大的,加上她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红军战士,又是主席夫人,大家都尊称她为贺大姐。

贺子珍一人抗大,有了新的奋斗目标,立即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尽管学习生活极为紧张,但她从不间断,只有星期六才回到毛泽东身边度周末,看望女儿,其余时间都在学习,同女学员住在一起,过着集体化的军事生活。

抗大的学习生活,给了贺子珍一种全新的感觉,她感到愉快和充实,她似乎又重新焕发出井冈山时期青春的活力。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贺子珍在抗大学习期间,我几次到学校看望她。她情绪很好,饶有兴趣地向我介绍抗大的学习生活。她说,小陈啊,抗大学习虽然紧张、艰苦、严格,但很愉快,你以后也应当来学习学习。我说,大姐,我真羡慕你啊。我又问她,学习什么课程和内容。她兴奋地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说,抗大正像主席说的那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出操,早饭后,上两个小时操后上政治课,下午上军事课和出操,晚间开会学习讨论或进行文娱活动。整天是在非常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中度过的。一次,我去看望她,正碰上她在上出操课,我看见贺子珍挺立在出操队伍中,穿着土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打着绑腿,英姿飒爽,像一个年轻妹子一样,头发梳得短短的,被风吹在前额上飘动,显得特别精神、秀美。”

然而,贺子珍万万没有料想到,这种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全新学习生活对她竟结束得这样快。由于抗大过的是紧张而艰苦的军事化生活,加上贺子珍生孩子不久,身体在长征中受伤又未完全恢复,营养也得不到补充,尤其是身体内的弹片未能取出,受伤处在天气变化时隐隐作痛。虽然她有一种顽强的意志,有强烈的上进心,但毕竟身体虚弱,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贺子珍去上厕所,突然眼冒金星,天旋地转,竟晕倒在厕所里,幸好被女学员及时发现,赶紧把她抬往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

抗大的领导见贺子珍身体如此虚弱,难以坚持学习,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让她辍学在家静养和休息。当时,毛泽东的工作繁忙,时常不在家,

家里只有贺子珍一人。她眼见人们都在为抗战紧张、忙碌地工作、战斗,而自己却呆在家里休养,日子长了,便感到了一份孤独和苦恼,心情也变得烦躁不安起来。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形势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和提高。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毛泽东此时是最繁忙的,他不但要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战争经验,特别要分析研究抗战形势,制定出在新形势下我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任务。同时,毛泽东又很喜欢同知识分子和外国朋友交往、交谈。他觉得这种交往、交谈可以使自己得到许多新知识,了解许多情况,得到很大启示,也感到很大快乐。不少人也主动找机会接近毛泽东,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经常高朋满座,谈古论今,讨论各种问题,十分投机。这时,贺子珍往往插不上话,除了送一些吃的东西外,一般只呆在自己屋里。毛泽东的确因公务太忙,无暇太多地顾及到贺子珍,与贺子珍之间的感情和思想交流不自觉地减少了。渐渐地,贺子珍产生了疑虑和孤独感,经常怏怏不乐,并且特别好激动。

在井冈山、瑞金时,毛泽东无论大事小事都对贺子珍说说,工作战斗之余,两人还常常坐在一起或到村外山上散散步,说说笑笑。毛泽东是一个知识渊博、典故丰富、说话风趣幽默的人,他把贺子珍不仅当作妻子,也把她当作小妹妹和学生看待,因为毛泽东比贺子珍大16岁,对贺子珍既爱又溺惯,以往总在生活和其他方面迁就于她,所以矛盾较少,两人恩爱很深。即使发生矛盾,也总是毛泽东让她三分,一笑了之。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贺子珍产生了许多误会。

本来夫妻间产生一些误会,也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只要双方冷静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误解就可以冰释了。可是贺子珍却不,她的性格过于倔强,她把气恼与痛苦埋在心底,在思想里掀起巨大的波澜,产生了许多奇异甚至偏执的想法。

贺子珍在1959年上庐山密见毛泽东前后,她将当时的思想告诉了陪她上山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

“那时,我心里不服气,我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我16岁参加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人的长相也不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那时我只有二十几岁嘛!……有时我气了与他(指毛泽东)吵,他不理我,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他却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对我,使我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看不起我了,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显然,这时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

显见的裂痕。如果贺子珍对此时的毛泽东更多一些理解,对自己性格、心理诸方面作适当的调整,努力摒弃自己的狭隘与偏执,是完全能够修补这些裂痕的。但性格一直倔强、执拗的她仿佛很难做到这一点。不久,发生的与女翻译吴莉莉吵闹的事,使她和毛泽东感情上的裂痕更深了。

贺子珍后来亲口向嫂子李立英讲述过这件事的经过:毛泽东那时经常接见来延安的外国记者、作家和朋友。史沫特莱来延安访问,随身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翻译,当然这是工作的需要。来之前,外事部门交际处向毛主席介绍外宾的情况时,同时介绍了这位女翻译,说这个女翻译以前作风方面不太好,这句话被贺子珍听到了。毛泽东为掌握外宾的情况,想通过翻译了解一些情况,做些交谈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天,毛泽东独自来到女翻译的住处。

贺子珍于是带着气呼呼的情绪,以及疑虑不安的心情到女翻译的住处去找毛泽东。当贺子珍走进女翻译住的窑洞院中一看,毛泽东与女翻译面对面地坐在那里谈话,按贺子珍说的是谈得火热,谈得眉开眼笑。贺子珍见此情景,心里充满火气,径直走进屋里。毛泽东仍在那里坐着,而女翻译则笑眯着脸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拉着贺子珍让她坐,说:“贺子珍,请坐,来!来!”

贺子珍因心里憋着气,此时,火气不打一处来,接过话头厉声厉色地说:“还来哩!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也不来这里!”

这一下把屋里空气弄得极为紧张,毛泽东也愣了。

女翻译顿觉气味不对,但尚未完全反应过来。贺子珍即转向毛泽东发火,她情绪太激动了,手也挥舞起来,一不注意,手划到了女翻译耳朵和脸颊上了。

“怎么你还打人?”女翻译竖起眉,瞪着眼,也很厉害地吵起来。

史沫特莱这时也闻声从隔壁窑洞进来劝架。

“走,跟我回去。”毛泽东见此情况又尴尬,又扫兴,当时也不好过多地说什么。

路上,毛泽东批评贺子珍:“子珍,你太过份了,太不像话了,这成什么样子?会造成什么影响?”

贺子珍火气正旺,听不进去。

事后,女翻译吴莉莉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造了不少舆论。

这件事确实使贺子珍与毛泽东夫妻感情上的距离拉大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贺子珍与毛泽东夫妻关系不和谐,即毛泽东爱跳舞,而贺子珍却讨厌、反对他去跳舞。

当时,跳交谊舞在延安很时兴,工作之余的毛泽东也喜欢到舞场松弛松弛。解放后,毛泽东曾和周

世钊先生谈及此话题：“在延安我们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位夫人贺子珍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我是主席嘛！我同恩来一些同志一去舞场，来请我们跳舞的女同志就会多一些，而且有些还是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但是贺子珍见了就不舒服，一见到我和女同志跳舞，她就有意见，经常为这事找我吵，找我闹，就这样，闹来闹去，影响了工作。”

贺子珍是个革命勇敢、意志坚强的女性，但在如何对待爱情、婚姻问题上又和很多普通妇女没多大差别。她深爱着毛泽东，爱得那么真挚、那么专一，她十分珍惜自己与毛泽东在10年异常艰苦岁月里建立起来的爱情，她内心深处唯恐失去她所深爱着的人。吴莉莉事件以及她讨厌毛泽东跳舞，无疑正是因为她这种心理而引发出来的，是她爱的情感的一种折射。但事情的发展却往往适得其反，最不愿发生的事反而发生了，最不愿失去的反而失去了。贺子珍在一次与毛泽东吵闹之后，情绪冷静下来，她陷入了沉思，她想到自己身体太不争气，留在身体内那该死的弹片使自己经常处于肉体的痛苦之中，想多做些工作往往力不从心，要想学习又不能坚持，做纯粹的家庭妇女又实在不愿意。闲在家里，心里烦躁，脾气变坏，为一些小事常和毛泽东吵闹，既影响他的工作，又影响夫妻感情。同时，生孩子也实在怕了，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在艰苦的条件里，营养得不到必要的补充，身体越来越差，这怎么办才好呢？

她几夜辗转难眠，思来想去，最后，她想，不如暂时离开延安，先到西安，再转到上海或苏联去治病，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一切都会好的。

贺子珍终于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先是感到意外，以为是她说说而已，后来知道她是认真的，就对妻子说出了一番极为恳切诚挚的话，不同意贺子珍离开延安：“子珍，你治病我同意，但可以稍等一等，上海战事如何尚未分明，可暂在延安治疗，情况允许，再到西安或到上海去治疗。我觉得你目前身体虚弱，且又怀孕，不宜作长途旅行，更不宜匆忙出国。我们之间的争吵，你不要过份计较，我们都不够冷静，都说了气话，我说后也都觉得很后悔，我工作太忙，无暇照顾于你，希望你能多体谅，我们是干革命嘛！”

又说：“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我的警卫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离开后，有的警卫员牺牲，我知道了难过得流泪；三是在贵

州，听说你负了重伤，快不行了，我掉了泪。”毛泽东说这番话时，浓浓的情感溢于言表。

贺子珍心里虽然也很感动，但她个性太强，决定了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何况这个决定也并非轻率作出的，所以无论毛泽东怎样挽留她，她都不肯，执意要走。毛泽东无奈，最后只好同意她去西安、上海治病。

贺子珍将不满周岁的娇娇托付给延安合作社的张秀英阿姨。她说：“我身体不好，自己又没奶，无法喂养孩子，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那里比这里还寒冷，我不能带这个瘦弱的孩子出走。她是我和毛泽东的亲骨肉，我真不忍心离开她。”说着流下了眼泪，不断地亲着孩子的脸。

在1937年初秋的一天，天阴沉沉的，秋风把地里的庄稼刮得沙沙响。贺子珍怀着一种无奈、忧伤甚至痛苦的复杂心情，离开了延安，离开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10年的丈夫毛泽东，踏上了去西安的路程。

异国漂泊十年

贺子珍乘汽车一路颠簸来到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停留了一段时间，心情依旧忧郁、烦恼，只想离开西安赴上海治病。当她得知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去上海治病无希望时，贺子珍陷入了失望之中。

正在此时，贺子珍知道苏联有飞机运一些军需物资来中国，中央决定送一些同志乘返程的飞机去苏联学习和治病。学习和治病正是贺子珍所企求的，于是，她毅然决定到苏联去，她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了在延安的毛泽东。

自从贺子珍离开延安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她，既担心她的伤病，又担心她的安全。当接到贺子珍决定去苏联的来信时，他考虑片刻，立即写了回信，用快件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交贺子珍，信的大意是要她别去苏联，迅速返回延安。可是，贺子珍没有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此后，毛泽东又先后委托去西安的陈正人、彭儒夫妇和李六如、王美兰夫妇做她的工作。陈正人夫妇还带去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答应在延安为她请最好的医生，买最好的药为她治病。毛泽东情意真切，殷切希望贺子珍回延安，回到自己的身边。然而，贺子珍还是未听毛泽东的话，下决心离开西安去苏联。

毛泽东见做工作无效，托人给贺子珍捎去一只装了生活用品的小木箱及一些食品。贺子珍收到后，想到毛泽东盖的那床被香烟头烧坏了的毛毯，又旧又薄，便用节省下来的津贴买了一床新棉絮人带给毛泽东。

在贺子珍即将离开西安前夕，毛泽东再一次挽留贺子珍，他要警卫员专程去西安。警卫员问是什

么任务。

“任务只有一个，请贺子珍回延安。”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警卫员到西安后，把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贺子珍，并转达了毛泽东劝她不要去苏联，速返延安的意思。但是，贺子珍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挽留。在警卫员返回延安时，贺子珍从她包里取出一块白手绢，用笔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去意已决，难以挽回”。她将这块白手绢叠好装在信封内，要警卫员亲手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这块白手绢，看了又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子珍，你也太倔犟了。”他把白手绢放入装文件的铁皮箱子里。自此以后，每当他想起贺子珍，毛泽东总要从铁皮箱子里拿出手绢来仔细端详一番。

解放后，陶铸夫人曾志有一次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曾志谈起了这件事：我和贺子珍夫妻10年，这10年是在最为艰难的环境中度过的。她前后怀了10胎，生了6个孩子，不容易啊！我当时实在不愿她去苏联，写了信，派了警卫员去西安接她回来，她不听，不肯回来，还叫警卫员带回了一块白手绢，在白手绢上写了“去意已决，难以挽回”的话。这块白手绢我至今保留着，实在不是我有负于她啊！

毛泽东见贺子珍执意要去苏联，最后勉强同意了，他对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张闻天说：“子珍既然非得一定要去苏联治病，就让她去吧。”

张闻天说：“你同意，我没意见。”当即复电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意贺子珍去苏联治病。

当毛泽东知道张闻天的爱人刘英也与贺子珍同机去苏联治病，就嘱托刘英说：“贺子珍小孩耽误了学习，你去苏联要在政治上帮助她，一起加强学习。”

1937年11月的一天，古老的西安城，天气已明显变冷，白杨树叶随着呼啸的北风飘落在地，城墙头上的草已变得枯黄，在秋风中不停地颤抖，西安古城显露出深秋的萧瑟。贺子珍，还有经中央批准到苏联治病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师政委钟赤兵等，搭乘火车到达兰州，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停留一个多月。

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与贺子珍长征时同在中央干部连，关系很熟，他知道毛泽东虽然同意贺子珍去苏联，但很有些勉强，所以就以长辈的身份劝贺子珍放弃去苏联，说：“一犹未可，岂可再乎？”意思是说，你离开延安，离开毛主席到西安就不应该，怎么能再一人去苏联呢？贺子珍还是没有听从谢老的规劝。

后来江青趁虚而人与毛泽东结婚了，造成了贺子珍一生的悲剧，谢老不胜后悔，说：“若知道造成这样的历史结果，我当时无论如何，就是采取硬性措施，也不能让贺子珍走。”

因为没等到飞机，一行人只好再乘汽车经过十几天颠簸到达新疆迪化。八路军新疆办事处联系到了去苏联的飞机。那天，迪化上空无云，天气晴好，贺子珍一行4人乘飞机离开迪化，飞往苏联。

莫斯科，这个全世界无产者向往的地方，共产国际在这里办了很多训练班。当时，我们党也曾把大批年轻的优秀干部送来这里学习、培训。

贺子珍到莫斯科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满月以后，她把孩子送进婴儿室，自己进了苏联专为培养亚洲地区工作人员开办的东方大学，开始了紧张而新鲜的学习生活。

不久，毛泽东给贺子珍发来了一份电报，询问她们母子的情况，并再次希望她早日回延安去。从国内来苏联的同志也多次捎来口信：毛泽东请她回去。这时的贺子珍已经不再与毛泽东怄气了，她只是想：既然来了，学习也已开始，怎么能虎头蛇尾呢？怎么也要坚持学完这期课程再回去。于是，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信的言词是和解的、诚恳的。

在莫斯科学习，条件是艰苦的。虽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给了他们较好的学习条件，每月70卢布的津贴，但为了支援在前线作战的苏联红军战士，女同志每天还要织袜子。一心要学习知识的贺子珍，并没有感到困难，她只是一心一意的学习，准备将来把所有的知识奉献给自己的祖国。

然而，好景不久，不测的风云降临了。正当贺子珍潜心学习的时候，她那刚满10个月的儿子，不幸由感冒转为肺炎，夭折了。

身处异地的贺子珍悲伤地掩埋了与她相依为命的小孩。痛苦和伤心淹没了她，使她变得憔悴而忧郁，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请人把娇娇送到了妈妈身边，以安慰那颗伤痕累累的慈母之心。

娇娇的到来，缓解了贺子珍的丧子之痛，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可打击没有就此结束，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蓝苹结婚了。这真是晴天霹雳，震醒了贺子珍的迷梦。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当初的轻率决定，铸成多么大的错误！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她的心颤抖了。此时此刻，她才明白，自己离开毛泽东，并不是因为不爱毛泽东了，而是因为她爱得太深、太苦了。她的心被痛苦和悔恨吞噬着！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了，看着别人高兴地收拾行装，准备归国。贺子珍迟疑了，她已经没有家了，丈夫已另有所爱，自己将归向何处，又怎样面对这个现实呢？

再三考虑，贺子珍决定留在苏联，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教那里的孩子学中文。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疏散到苏联东部的伊万诺夫城，国际儿童院